

# Pearl of the Mediterranean

A wide-angle photograph capturing a massive swarm of pigeons in flight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city skyline at sunset. In the center-left, a tall, light-colored minaret rises vertically. The sky is filled with the silhouettes of numerous pigeons, their wings spread wide. The sun is low on the horizon, casting a warm, golden glow over the scene. In the background, modern buildings and trees are visible under a clear blue sky.

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明珠，一颗稀有而美丽的珍珠，可它却披着带刺铁丝网所造成的伤痕，带着分隔围墙所导致的痛苦……最近几十年中所承受的可怕撕裂，是这片土地所遭受过的最大创伤。”——教皇方济各

编辑 陈诗阳 • 文 张侃 • 图 张侃、视觉中国

## 高墙下的地中海明珠



(前页图)和平鸽在尼科西亚北侧的广场上飞舞,然而被绿线割开的塞浦路斯,却迟迟等不到彻底的和平。

(本页图由上至下)绿线上的一面隔离墙,不同旗帜飘扬在两侧,中间的墙面被画上了一幅完整的塞浦路斯地图;一只趴在隔离墙上的猫。

(对页图)一位女士正从绿线内的建筑废墟下走过。

我第一次去塞浦路斯时,埃尔詹国际机场(Ercan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海关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给队伍里的旅客挨个盖着入境章,就像一台在流水线上不停运转的机器,直到他注意到我递上的中国护照,便开始拿在手里反复翻看。“中国人?来旅游?”他抬起头,瞅了一眼背着大包的我。

我并不怕他翻护照,毕竟在这个几乎对全世界游客都免签的地方,我从未听说谁被拒绝入境。但从他一脸好奇的神情看,大概是还未见过来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游客。

“哈!”他给我戳上入境章。“欢迎你,我的朋友!”我就这样进入了这个“不存在的国家”——“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那时,埃尔詹国际机场所在的塞浦路斯岛北侧仍然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唯一允许中国人免签进入的地方。并非其他中国游客不想来这里享受海水与沙滩,而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此地的存在——在祖国出版的所有教科书与地图里,塞浦路斯岛上从来都只有一个国家——塞浦路斯共和国,而这里并不存在对华免签。

事实上,打开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土耳其)的教科书和官方地图,塞浦路斯岛上都找不出第二个国家。然而一个自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TRNC)的政权却割据着这座岛屿北侧近一半的土地,这里的货币、语言、签证政策甚至手机信号都与南边迥然不同。正如“国名”所暗示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承认它,便是它的“母国”土耳其。

## 最后一座分裂的首都

埃尔詹国际机场是“北塞浦路斯”唯一的民用机场,距“首都”尼科西亚(Nicosia, 土耳其语称莱夫卡西亚, Lefkoşa)只有半小时车程。刚结束土耳其旅行的我,很难感觉自己身处一座新的“国家”:街头招牌上写着土耳其文,土耳其里拉在此通行,就连街头都飘扬着“红底白星月”国旗。与土耳其国旗并肩悬挂的,就是“北塞浦路斯”那面仿佛只是将色彩简单颠倒后的“白底红星月”旗。

硬要找出这里与土耳其的不同,大约只有两处:一是所有车辆都改沿道路左侧行驶,二是土耳其手机卡在这里没了信号——前者是英国80余年殖民统治留下的印记,后者则像是在有气无力地宣示自己的“独立”。

我从“沙发冲浪”(Couchsurfing)网站找到免费住宿,招待我的是正在这里读大学的土耳其人菲拉特。他租住在尼科西亚市郊一栋民宅里,和他的室友兼同学卡迪尔都是来自土耳其东南部的库尔德人。

菲拉特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来此上学的原因:“我的成绩不够在土耳其读大学,但‘北塞浦路斯’学校的录取分数更低。”在“英式教育”旗号的宣传下,“北塞浦路斯”如今的教育产业蒸蒸日上,从英语专业到以英语授课的





(上图)坐在边界公园围网前悠闲饮茶的当地人，这里曾是尼科西亚老城的城墙。  
(对页组图)尼科西亚由绿线分割成南北两个区域，原本最繁华的尼科西亚老城中心变为紧邻边境禁区的荒凉之地，南北来往也不再畅通无阻，隔离墙还成了街头艺术家创作的场所。

各类课程都靠着相对低廉的学费与不高的入学门槛，吸引着土耳其乃至世界各国的学生前来。

然而我此行并非考察当地教育，我是冲着“世上最后一座分裂的首都”而来的。土耳其族占据着尼科西亚的北半边，而城市南半边则由主要居民为希腊族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统治。

一堵高墙分开了两个民族的领地，确切地说，那是一块东西走向贯穿全岛的狭长封闭区域，全名“塞浦路斯联合国缓冲区”(UN Buffer Zone in Cyprus)，俗称“绿线”(Green Line)，目前由联合国维和部队驻守。在尼科西亚，绿线刚好从威尼斯统治时期留下的圆形老城中心穿过，从地图上看，就像一块蛋糕被精确切成两半。

“我从没去过南边，因为我没办法跨过绿线。”菲拉特对我说。

绿线的由来得从1960年讲起——那年，塞浦路斯全岛从英国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塞浦路斯共和国这个由约70%希腊族和30%土耳其族及外籍人组成的新生国家，搞出了一套写满妥协的“双头三主政体”：总统与副总统由希族与土族分别选出，内阁成员则按7:3分配。与此同时，希腊与土耳其作为两族各自的“宗主国”，被允许按3:2的比例在岛上驻军；而英国为维系自身在地中海乃至苏伊士运河的影响力，在此保留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军事基地。

在之前的数百年间，两族一直混杂居住在这座小岛上，相安无事。他们生活在相邻的两个社区，甚至是同一座村庄里。岛屿南北，希腊族东正教堂的钟声与土耳其

族清真寺的宣礼声每日交相回荡不绝。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统治末期起，两大民族就陷入了纷争——希腊族占据人口优势，其中一小撮激进分子成立了“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EOKA)，用暴力甚至恐怖袭击的方式推动全岛并入希腊；而身为少数者的土耳其族中的一些人，也借着土耳其驻军的威慑力，高喊“Taksim”(意为“分治”)口号，力争要在全岛独立后划出一片专属于土耳其族的区域。

我离开菲拉特家，向尼科西亚老城走去。半路上有座不起眼的平房挂着一块令人费解的门牌：野蛮博物馆(Museum of Barbarism)。从布局看，房屋显然曾是座民居，馆内未加修饰的墙上挂满黑白照片：一名中年男人被子弹打穿头颅、三名男孩和一名年轻女人躺在浴缸的血泊中等——全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当仔细打量这座空荡的房子时，我才发现房门上、家具上，甚至浴缸旁的墙壁上竟都布满了细小的弹孔，一阵寒意不由从背后袭来。

根据介绍，这栋房子属于土耳其驻塞浦路斯部队的尼哈特·伊尔汗博士(Dr. Nihat İlhan)。1963年圣诞节前后，塞浦路斯全岛爆发了独立后两族第一次大规模冲突。超过





(上图起顺时针)记录着冲突与血腥的野蛮博物馆;尼哈特·伊尔汗博士的妻子与三个孩子遇难时沾满鲜血的衣物;四人遇难前躲避的浴缸,墙上有布满枪眼。  
(对页)尼科西亚老城的街巷格局与大量历史建筑仍保存完好。

500名平民死于那场事后被称作“血腥圣诞节”(Bloody Christmas)的暴力事件,伊尔汗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就在其中。在那个不平安的平安夜,希腊族激进分子冲进他们家中,射杀了躲在浴室中的四人,伊尔汗本人因当天值班而逃过一劫。

两族冲突之后,负责维护塞浦路斯和平的英军指挥官用绿色铅笔在尼科西亚地图上画出了一条隔开两族占领区的停火线,这便是绿线的前身。英国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Colin Thubron)在《深入塞浦路斯》(Journey Into Cyprus)一书中记载了他于1972年到访尼科西亚时所见的绿线——当时只有一些路障,尽管由联合国驻军把守,但所有人仍可随意往来其间。

在书中,他把所见尼科西亚的状态形容为“弹指可破的风华”,不想竟一语成谶——1974年,希腊族激进分子策动了一场企图将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政变,打破了短暂而脆弱的和平。土耳其顺势出兵干涉,几天之内,整座塞浦路斯岛就被硬生生切成两半。从此,没人再能够自由穿行于这座岛屿的南北两侧,就如当年人尽皆知的柏林墙或如今的朝韩非军事区(DMZ)那样,绿线成了一条真正的死线。

尼科西亚老城不大,城中处处泛着颓败气息,是典型的东地中海黎凡特(Levant)地区风貌。一如柏林墙,尼科西亚的南北分野也是短时间内人为造成的,世代居于此的市民从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因此当我循着地图找到穿城而过的那条“线”,发现被围入南北两道墙中的竟是一幢幢普通民居。从建筑形制看,墙内与墙外的屋子并

无任何区别。然而被围进墙中的建筑,窗棂早已残破,墙皮纷纷剥落,时光仿佛被永久封印在战火初起的那一刻。

“我小时候住在墙的另一边。”一位先生捻着胡子,缓缓对我说道。他正坐在街口饮茶,典型的土耳其面孔因常年暴露于地中海阳光下而晒得黝黑,然而举手投足间仍有旧时英国绅士的风度。

“我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墙里的这栋楼,还有一位住在那个方向。”他指着远方,言语有些唏嘘,“他们都是希腊族,但当时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

“那您后来见过他们吗?”我问。

“当然了。”他发出爽朗的笑声,“1974年打仗,2003年关口重开时我们才又见到,都快认不出彼此了。”

老先生口中所说的“关口”,指的是绿线上连通南北的过境点,如今尼科西亚共有两座过境点,莱德拉街(Ledra Street)上的这座是唯一位于老城中的。我来到过境点的北侧入口,几个年轻人正在入口前的空地上跳着街舞。过关行人往来不绝,大多没有携带任何行李,只是简单掏出证件递给亭子里的警察看,接着头也不回地走过边境,完全没有“出国”的仪式感。

随着2003年过境点开放,尤其是2004



(本跨页左上图起顺时针)透过绿线铁丝网窥见的禁区内部，曾经的街道与商铺已全部朽败；绿线从老城中心穿过；莱德拉宫过境点旁，写着“和平”的一面墙；尼科西亚北部的一场手工市集；位于尼科西亚北侧的塞利米耶清真寺(Selimiye Mosque)内部。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后，1974年分裂前就居于岛北部的居民也一并获得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国籍与欧盟公民身份；而“北塞浦路斯”当局也大方地准许所有人从南侧自由出入。

穿越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绿线对本地人来说变得毫无困难，但对于菲拉特和我这样的外国人，情况却迥然不同——南侧把一切非欧盟公民从“北塞浦路斯”入境的行为视为非法，因此欧盟公民之外的人即便持有南侧认可的签证，也无法从北侧入境。

绿线最宽处超过7公里，将曾经的尼科西亚机场和若干座村庄都包入其中；最窄处仅有3.3米，就位于老城西侧的边界公园Sınır Parkı旁。公园建在老城墙(即威尼斯墙，Venetian Walls)西面突出的圆形堡垒上。有些讽刺的是，这圈当年由威尼斯人修筑用于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入侵的坚实环形城墙，如今却成了土耳其人居高临下宣示“主权”的地方。

土耳其国旗与“北塞浦路斯”旗高悬旗杆之上，希腊国旗与塞浦路斯国旗则在南侧飘扬，仿佛要一争高下。两者中间只相隔一道稀疏的铁丝网。南部的马路上车辆行人往来，车辆外形清晰可见，就连人们的谈话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站在此处，会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铁丝网隔开的不是已对了40多年的两个政权，而只是一座普通的城市公园内外。

几个南亚面孔的年轻人正在此伴着歌声手舞足蹈，歌声来自铁丝网对面的酒吧，“这是我们国家的音乐！”跳舞的年轻人冲我大喊，摇晃着手中的酒瓶，一脸的自豪。他们是从斯里兰卡来的劳工，这天是他们的假期。同样去不了南边的他们，只能跟我一样到铁丝网前感受对面的气息。



## 寻找“日出酒店”

小巴车把我放在塞浦路斯东岸城市法马古斯塔(Famagusta)老城门前。天阴沉着，我穿过厚实的石桥进城，桥下是已经干涸的护城河。如今我所见的这座仍透着威严的恢宏城池，始建于12世纪末法兰克人统治的鲁西格南王朝(Lusignan)时期。在此后的近800年中，法马古斯塔在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与英国人之间数度易手。莎士比亚笔下闻名遐迩的悲剧《奥赛罗》就发生于老城旁的那座海岸城堡(今奥赛罗城堡)，而故事发生的16世纪末，也正值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激烈争夺此地的年代。

行走在老城中，无论是错综复杂的蜿蜒巷弄、整体改成清真寺的哥特式教堂，还是沿路招揽游客的小餐馆，一切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这里只是一座更冷清的“小尼科西亚”。自16世纪奥斯曼人夺下法马古斯塔，这座老城便一直是土耳其族聚居区，而大多希腊族则住在老城以南名为瓦罗莎(Varosha)的新城。

自老城出城向南，远远便能望见新城那片参差错落的混凝土建筑群沿海岸绵延，排布成一条近乎完美的圆弧，蔚为壮观。然而只有走到近前，才能发现楼上的每一

扇窗户都没了玻璃，只留下一个个漆黑的破洞，积攒已久的陈腐气息肆意向外散发着；早已朽烂的窗框随风摇曳，似乎下一刻整栋楼便会轰然倾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楼前那片细软的优质沙滩。

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在这整排废墟中，哪一座楼最像“日出酒店”？

《日出酒店》(The Sunrise)是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希斯洛普(Victoria Hislop)的一部长篇叙事小说。书中虚构的那座同名酒店在1974年塞浦路斯内战前不久才落成。作为这片沙滩上最豪华的酒店，那里灯红酒绿，夜夜笙歌。酒店虽是虚构，但那个炙手可热的度假胜地瓦罗莎却千真万确。一张在我此刻所站位置拍下的老照片展示了这里的热闹——沙滩上挤满了身材火爆、穿着入时的度假客。而仔细辨别就不难发现，他们身后的那排建筑的确就是我面前残破不堪的这几栋。只不过那时的楼房都刚刚粉刷一新，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法马古斯塔老城的拉拉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Lala Mustafa Pasha Mosque)，外立面依然保留着初建时基督教教堂的样貌。1571年，占领塞浦路斯的奥斯曼人将其改为清真寺并沿用至今。



(本跨页图从左至右) 曾经炙手可热的假胜地瓦罗莎;早已破败的豪华酒店的大落地窗;将瓦罗莎整个包围的铁藩篱,牌子上用 5 种语言写着“禁区”。

“法马古斯塔是个金子般的地方。”希斯洛普在全书第一句如是写道。

作为一部描绘战争的小说,希斯洛普并没有对战事的惨烈着墨太多,反而始终在刻画主人公阿芙洛狄忒因战乱而被彻底改写的生活与人生。战争前,她是万众瞩目的日出酒店老板娘,拥有令人艳羡的家世与奢靡的生活。这一切看上去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直到战争不期而至——度假客乃至全城的市民几乎都在一夜之间仓皇逃离,被土耳其占领的瓦罗莎变成了一座彻底的空城。为了找寻下落不明的情人,本已逃出瓦罗莎的阿芙洛狄忒不惜花费重金,费尽周折回到此地。然而在这里,她不仅没有找到自己的情人,相反受尽凌辱……

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亲历过战争,因此每每听到或看到有关战争的描述时,所想象出的场景大都是宏大的、抽象的。但是真正亲历战火的人,反而会因为通讯的中断而对战争的全局一无所知。他们唯一能真切感受到的,便是当下自己的处境。

沙滩上遗留着一只白色塑料躺椅,也许夏天的时候,在这片还没被划入禁区范围的沙滩上还是会有稀稀落落的游客吧。但此时此刻,在背后那片巨型废墟的掩映之下,孤零零的躺椅无疑让沙滩都显得愈发凄楚。

沙滩尽头是一面锈迹斑斑的铁丝网,褪色的警告牌

上画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土耳其大兵,用四种语言警告着路人此处是“禁区”。自 1974 年战争爆发,再也没有任何平民能获准进入被土耳其军队占领的瓦罗莎城区,甚至包括合法拥有城中房产的原居民。

整座城市都被密实的铁丝网围起,也造就出这座著名“鬼城”。事实上,我只需绕着铁丝网转上一圈,就足以看到许多让人难以想象的悲伤场景:店铺门前是早已褪色的希腊文招牌,20 世纪 70 年代款式的豪华轿车只剩锈迹斑斑的铁壳……

我在海滩上踱着步,久未有游人涉足的沙滩被我踩出或深或浅的印记,可随着浪花拂过,那些印记又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排曾经的奢华酒店镶满了密密麻麻的窗口,每一扇窗口的背后或许都曾住着一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在那场使瓦罗莎沦为废墟的短暂战争中,这里的人们究竟经历了什么,现在又有谁还记得呢?

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罢了。



## 无人朝圣的“圣地”

(上图)拉纳卡盐湖的日落。  
(对页组图)哈拉苏丹清真寺和乌姆·哈拉姆的陵墓,以及在拉纳卡盐湖嬉戏的火烈鸟群。

那次的塞浦路斯之行走得匆忙,特别是因为从北侧入境而无法进入南侧,让我留下了太多遗憾。于是当我一拿到申根签证,便立刻买了一张去塞浦路斯的机票。

飞机降落在拉纳卡国际机场(Larnaca International Airport)。自尼科西亚机场被围入绿线而废弃,拉纳卡这座位于东南海岸的小城便成了塞浦路斯南侧对外通航的主要地点。

在我计划探访的地点中,距离最近的是乌姆·哈拉姆(Umm Haram)的陵墓,陵墓所处的哈拉苏丹清真寺(Hala Sultan Tekke)就在机场旁。墓主人乌姆·哈拉姆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位世伯母,也是他的追随者之一。相传年迈的她在随夫征服塞浦路斯后,意外从所骑的驴上摔下而客死他乡。颇讽刺的是,这个如今偏居希腊族区一隅的地方,却是全岛最重要的伊斯兰圣地。若干篇文献都记载,这里的重要性高居全球伊斯兰圣地第三(或第四),仅次于世人皆知的麦加、麦地那(及耶路撒冷)。

陵墓坐落在拉纳卡盐湖(Larnaca Salt Lake)边,湖面碧波荡漾,成群的火烈鸟在湖边嬉戏。比起它的地位,陵墓的规模小得让人难以置信:尚算有气势的正门之内,只有一间狭小的墓室,垂下的绿色帘幕环绕着唯一的棺椁。哈拉苏丹清真寺同样朴实无华,唯一的宣礼塔孤独耸立,类似规模与形制的清真寺在“北塞浦路斯”比比皆是。

一名中年男人走来,向我挥手致意,自顾自地介绍起这里:“她是位善良的女人,非常非常善良。不只是我这么说,曾经希腊族也这么说。我们土耳其人叫她‘苏丹阿姨(Aunt Sultan)’。你知道的,‘苏丹’的意思是‘国王’,是我们对一个人最崇高的称谓。”

男人叫穆斯塔法,生在拉纳卡,内战后曾随家人移居北侧,直到几年前重新回到家乡,做了陵墓的管理者。只是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人来这座“圣地”朝圣。

“平时会有人来这里礼拜吗?”我问他。

“有的,当然!不过大多都是外国劳工,像是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拉纳卡现在基本没有土耳其族了。”

“现在,土耳其族,在北边;希腊族,在南边。都分开了。”他用两手比画着“分开”的动作。“但你要知道,战争前我们大家都住在一起,甚至是在同一座村子里。”说着,他又猛地将两只手交握在一起。

“我们曾经是朋友,全都是朋友。”他这么说道。

这句话让我感到无比熟悉。英国作家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曾出版过一本记录他20世纪50年代在塞浦路斯生活的书《苦柠檬之岛》(Bitter Lemon of Cyprus),那时塞浦路斯尚未分裂。他的一位当地朋友曾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塞浦路斯很小,而且我们大家都是朋友,虽然彼此很不一样。这就是塞浦路斯。”

“现在还有那样的地方吗。我是说,希腊族和土耳其族还是朋友的?”

“几乎都没了。”他怅然地摇头,“就只剩皮拉(Pyla)了。”



## 一座矛盾的村庄

(上图)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皮拉的小咖啡馆打牌。  
(对页图)皮拉村中的联合国派出所。

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前往皮拉。村子就在拉纳卡城外不远处，从地图上看，皮拉大部分都被包在绿线中——这是绿线上为数不多外人可以进入的地方。

联合国的蓝色旗帜挂在村口，街上冷冷清清，从店铺招牌显示的村庄名字就可以明显区分出店主的族群——希腊族把这里叫作“Pyla”，土耳其族则称之为“Pile”。就连招牌上面印的手机号也有明显不同：土耳其族大多使用北侧的电话卡，电话区号与土耳其相同，而他们的基站就建在不远处土耳其军队控制的那座山顶，正对着山下虎视眈眈的哨所。

村里有两座咖啡馆，分别属于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其实追溯起历史，希腊族喝咖啡的习惯源自奥斯曼统治期间的土耳其人。然而在如今的皮拉村，两座咖啡馆各自的顾客却已完全泾渭分明。

“所以你们跟土耳其族是什么关系，像是……朋友？”我问希腊族咖啡馆里一位在下双陆棋的老人，想确认前一日穆斯塔法对我说的话。

“朋友？”他发出轻蔑的笑声，“不，我可没把他们当朋友。土耳其族太狡诈，他们都是天生的生意人。”他的情绪愈发激动，下意识地伸手对着土耳其咖啡馆的方向用力指指点点：“他们竟然还在村里开了家赌场！政府也不管，这像话吗，真把这里当成北边了？”

大概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稍停顿了一下，接着缓缓补充道：“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确一直生活在一起。

土耳其人是侵略者，是我们的敌人，但塞浦路斯的土耳其族不是。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踢球，但有时也会打架。不过现在，我不会再让我的孩子去跟土耳其族小孩玩了，太危险了。他们的学校，土耳其来的老师，教孩子仇恨我们。太坏了，他们太坏了。”

他说的“土耳其学校”就在村中，就如我在土耳其见到的每一所学校布局：国旗随风飘扬在校舍门前，旁边立着一尊“国父”凯末尔的塑像。

那天是周末，学校空无一人，因而我无法了解这里是否会教给学生“仇恨希腊族”。但当逛完整座村子，有一点我非常确定：村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希腊区”或“土耳其区”，两族在此完全是交杂而居。假如希腊族咖啡馆里那位老人所说是真，那么如今两族仍交杂居住的情形或许暗示着在不久以前，两族还是比现在亲密得多的关系。

离开皮拉前，我爬上村口欧盟出资修复的那座威尼斯时期塔楼房顶，近前的清真寺宣礼塔与远处东正教堂的钟楼得以同时收入眼中。

“不是朋友”却也“不是敌人”——这个充满矛盾的叙述仍让我感到困惑：世代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他们，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





## 一场当地人的聚会

(上图)尼科西亚南侧，民居的阳台上飘扬着希腊国旗，映衬着远处的土耳其国旗和“北塞浦路斯”旗。

(对页组图)尼科西亚仍保留着部分老建筑，其中莱德拉宫过境点是尼科西亚南北两侧通行和磋商的重要地点；如今还有艺术家会在街区进行艺术创作。

我想听到更多塞浦路斯普通人的声音，因此再回尼科西亚的时候，我又打开了“沙发冲浪”网站。这次，我报名了一场当地沙发主举办的定期聚会。为了方便那些无法跨境至南侧的移民和留学生，每次聚会的地点都会选在绿线以北，这次也不例外。

除了“方便北侧居民”，总选在北侧聚会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酒价低廉。为吸引游客而设置的低廉酒税让这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了地中海周边买酒最便宜的地方之一。甚至连 90 多度的塞浦路斯鱼尾葡萄酒（Zivania）这类在欧盟禁售的烈酒，在北侧也可以轻易买到。

聚会的酒馆，就开在穿越绿线的莱德拉宫（Ledra Palace）过境点旁。“莱德拉宫”曾是一座酒店的名字。老城西墙外这座有着犹太风格的建筑自从 1949 年落成，就一直是尼科西亚最大、最豪华的酒店之一，直至 1974 年内战爆发，因酒店刚好地处尼科西亚中心，其周边成了战事最激烈的地方，莱德拉宫便成了尼科西亚版的“日出酒店”。

“当救援行动最终到来时，380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已在尼科西亚莱德拉宫酒店被困了 30 个小时。外面战斗肆虐，他们没有水、电力和食物。”当年的新闻如此记载。

战后，被划入绿线中的莱德拉宫酒店被联合国接管，成了驻军的办公与居住场所，也是两侧多次举行会晤的地点。而如今的建筑两侧，又分别成为同名过境点南北方各自的入口。

我从南侧过境去北侧。过境点入口处摆着几块巨型展板，控诉“土耳其对塞浦路斯的侵略”；对面北侧的出口则针锋相对地用英语写着“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万岁”。

小酒馆里人声鼎沸，参加聚会的大都是本地的老熟人。希腊族中年男人潘德利斯是聚会的组织者，身为大学老师的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透着一丝属于学者的优雅气质。我找了个机会向他请教：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与希腊人之间，生活习惯上是否会有所不同？

“那可太多了。”他回应说，“从说话的口音、一些词语的用法，到各自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都非常不一样。”

一旁的土耳其族小哥詹图也插进这个话题来：“我们和土耳其人其实也很不同啊……要说我们跟土耳其人区别有多大，我倒觉得……不如说我们跟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更像一点！”

听到这个夸张的比喻，大家喜笑颜开，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你们各自的宗教呢？”我追问。在土耳其和希腊旅行时，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当地人对各自宗教的笃信。



“说实话，我们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信徒。”詹图反问我，“你觉得我算穆斯林吗？”

“过节的时候，我也会跟家人去清真寺。但是……”他举起面前的酒杯示意，“你看我喝酒，有时还吃猪肉，我不觉得我算穆斯林。不过，希腊族好像信教的多一点。”

“我们也没有很信教。”潘德利斯接下他的话，“其实差不多，我也只是偶尔去教堂，但绝对不是每周去礼拜那种。”接着，他转过头来对我说道：“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区别，真的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我们两族之间，谈恋爱甚至结婚都很常见。”

“你跟我们希腊族姑娘谈过恋爱吗，年轻人？”他问詹图。

“嗯，曾经的确有过一个……”詹图不好意思地低下

头去。

我对他们讲起自己在皮拉村的所见所闻。

“当然会有矛盾。”潘德利斯回应道，“任何人都会有矛盾，我跟我老婆有时还吵架呢。可那些政客，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土耳其人，却希望我们互相仇恨对方。”

“不幸的是，让这些子虚乌有的仇恨传播开来，是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们塞浦路斯有句俗语：‘传播最快的東西有两个，除了山火就是流言蜚语。’这显然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



(本跨页对页图起顺时针)皮拉村旁的军事哨所；阿肯哲拉尔村口，有气无力旋转着的彩色风车；阿肯哲拉尔村中建筑；阿肯哲拉尔村的旧照。

## “我是塞浦路斯人”

阿肯哲拉尔 (Akıncılar, 又称 Louroujina) 村位于塞浦路斯岛中央的腹地，这里也是“北塞浦路斯”最南端的村庄。村庄四面几乎都被绿线重重包围，只有东北侧唯一的道路联通外界。

我行驶在通往村子的那条路上，道路两侧尽是雨后郁郁葱葱的绿地，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地图显示，我左右 100 米处应当就是绿线边缘了。然而绿线在此处似乎已经消失，这里没有任何标记界线的物品，我甚至能清晰望见一公里外属于南侧管辖的那座村庄。

我不知道如果此刻我转向驶下这条公路，沿两侧无数尚有车辙痕迹的那些土路驶往另一侧，会发生什么？是会被突然冒出的军人逮捕甚至追击？还是什么都不会发生，就这样长驱直入地驶进南侧领地？

眼前这座阿肯哲拉尔村像是一处几近被废弃的定居点。破败的民居零星地排布在山前空地上，其间夹杂着各种残垣断壁。被涂得花花绿绿的铁制风车在村口有气无力地转动着，成为全村最艳丽的一抹色彩。

我径直开到路尽头，一道半人高的石砌矮墙挡住了前方的路，还有一座并没有人值守的岗亭，旁边歪歪扭扭摆着一排用作路障的旧油桶。

回头折返，不远处有间活动中心，希腊式的廊柱建筑焕然一新，与村中其他破败房屋形成鲜明对比。几位中年女士正在这里学习手工制作，一旁放着她们已经完成的十字绣作品。

她们的老师同样是位中年女士，讲着一口令我惊讶的流利英语。“你应当来看看这个。”她打开旁边屋子的小门，门内密集地堆着一块块挂有黑白照片的活动展板。展板上落满灰尘，似乎是很久之前某次展览的遗留。

“我出生在这里。小的时候，村里有 5000 多人……这张照片是村里的学校，这张是每周末都有的市场，这张是村里的足球队。”她费力地拨开展板，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着每张照片的内容。“但是战争以后，大家都走了，现在只剩下不到 300 人。”

“我去尼科西亚读了大学，又在外面工作了很久。但我还是会想念这里，所以我回来了。刚刚你看到的学生，她们都是留在村里的……我想让她们学会点技能，这样在村子里也能赚到钱。”

“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感叹，“你说你出生在这里，所以你是土耳其族对吧？”

“不。”

“难道是希腊族？”她的否认让我惊讶不已，我追问。

“我是塞浦路斯人。”她答道，“我讲土耳其语，但我不是土耳其族，也不是希腊族。我生在这座岛上，我是塞浦路斯人。”

## 尾声

旅程的最后，我再次回到尼科西亚，跟朋友约在北侧市中心的汉堡王见面。这是尼科西亚北部目前唯一的一家国际连锁餐厅。有趣的是，在我第一次来此地时，同一位置还叫“汉堡城”（Burger City）——这个名字充满山寨气息的店其实同样是汉堡王在经营。只是因为国际制裁，汉堡王的国际商标无法在“北塞浦路斯”合法使用。

塞浦路斯共和国对北侧一直进行着全方位封锁，世界各国都不被允许同北侧直接通商或通航，连在北侧使用商标都不行。时至今日，“北塞浦路斯”对外所有的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仍只能通过土耳其转。

“所以你们这回终于能‘抬头做人’了吗？”我指着餐盘上的“汉堡王”商标笑问朋友。

“难道你不知道？这才没多久，我听说他们已经顶不住南边的压力，又要改回去啦！”他无奈地摇着头，“整天只会改来改去，‘全球化’跟我们没有半点关系，我看不到这个小地方有什么未来！再过一阵子，我准备去德国工作了。你知道的，那边有很多土耳其人。”

朋友虽身为北侧居民，但同时也是塞浦路斯共和国护照的持有者。这让生在这个“最不全球化”地方的他能享受到“最全球化”的欧盟公民权利。

塞浦路斯加入欧盟的2004年，其实也是距离结束分裂状态最近的一次。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主导的“安南方案”，试图将南北两侧所有塞浦路斯人都归于同一个“由两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联邦国家”之下，并同时加入欧盟。然而在公投中，尽管北方的土耳其族大多选择支持，南方的希腊族却将其否决——那时的希腊族，仍期盼着按照1960年独立时协议的那样，让全岛都重归于他们的主导之下。

公投失败的后果便是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了欧盟，与不被国际承认的“北塞浦路斯”渐行渐远。而那本薄薄的欧盟护照，成了北侧居民能享受到的唯一福利。

后来，突如其来的疫情便席卷了整个地中海乃至全世界，而绿线也自2003年重开后第一次彻底关闭。在这段特殊的隔离岁月中，岛上经历了再一次“极速右转”：主张两族和解的北侧原“总统”连任失败，受土耳其支持，高呼“两国分治”的继任者走马上任。

我不知道自己在塞浦路斯遇见的那些朋友们在此番投票中都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但看起来，这似乎并不是那个他们所期待的未来。⑩



**张侃**永远好奇心过剩的旅行者，开车走过四大洲50多国。兴趣包括民族、宗教、边境、历史……塞浦路斯刚好能把这些元素全部囊括。微信公众号： 行男侃叔。



把自己称为“塞浦路斯人”的阿肯哲拉尔村妇女。